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

龚云 李雪银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与双向建构，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所固有的资本中心与扩张性局限，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发展道路。它以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在制度与理论层面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不仅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更以持续的发展效能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生命力。通过阶梯式、渐进式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分步推进的战略进程，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能够通过接续奋斗实现的可行道路，从而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直面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困境，以其在战略规划、制度调适和政策创新中形成的系统性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非依附性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文明互鉴与和平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化的对抗逻辑，推动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这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显著增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感召力，也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注入了强劲信心，从而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文明对话与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共同富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雪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6)01-0002-28

“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紧密结合，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标志性特征形成的基础。”^①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历史上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其内在的资本扩张逻辑也不断催生贫富分化、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一系列矛盾。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起，就致力于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力图克服其固有的资本扩张逻辑及其所引发的矛盾。苏联的现代化实践曾在一定时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叙事，但终因体制僵化而停滞。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的兴起更使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中国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具有系统性、延续性的中长期规划，稳步推进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范式枷锁，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实践动力与理论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连续性和战略累积特征，这集中体现于已延续 70 余年的“五年规划（计划）”体系之中。^② 自“一五”计划起，中国通过连续实施五个五年计划，在薄弱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的实践，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进入新时代，通过实施“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中国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由此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 14 个五年规划（计划）的连贯实施，不仅清晰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实践轨迹，而且集中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长期发展中所具有的战略定力、规划能力和动态调适韧性。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外部模式的机械套用，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主探索。它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致力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种发展道路不仅有效统筹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更突破了单一发展模式的局限，从而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强大生命力与解释力。

^① 庄泽林：《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载《科学社会主义》，2023 年第 5 期，第 90-97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一 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系统性社会变革过程，自其起源阶段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交织，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特定发展路径与文明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内含的剥削、危机、异化等矛盾的深刻批判，也标志着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自觉超越资本逻辑的新阶段。因此，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决定或依附，而是呈现为一种深刻的历史性互动与辩证发展：现代化进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丰富提供了物质前提与历史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则不断重塑现代化的目标、路径和内涵，尤其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实践中开辟了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种互动关系在当代辩证结合的发展成果，它以实际成就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同现代化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自身的探索路径推动了现代化模式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演进。

（一）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辩证回应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开启于西欧^①，自其发端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在机器大工业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现代生产方式通过对分散生产资料的积聚、劳动人员的集中和生产过程的科学分解，实现了基于分工的广泛协作，从而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② 随着生产工具的持续革新、自然力被大规模征服利用，封建的或行会性质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最终为自由竞争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取代。工业革命所确立的机器化大生产不仅推动了生产力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也重构了整个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使资产阶级得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由此，“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④得以确立，并塑造出“现代工业”

^① 刘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1-18页。

^② 谢富胜、江楠：《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载《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5期，第69-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现代经济关系”乃至整个“现代社会”^①。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打破了以往“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②，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现代生产方式因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而具有内在的扩张性与变革性，它“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③，而是不断推动技术基础、劳动过程与社会结合的革命，进而使一切社会关系处于永恒的动态重构之中。于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④，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制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标志。

然而，这种以资本逻辑为组织原则的现代化模式在其历史展开中日益显现出深刻的辩证张力：它在创造空前生产力的同时，也系统性地生产出贫困、异化和不平等；在建立全球联系与世界市场的同时，不断再生产出支配与依附的国际秩序；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导致生态代谢的断裂。无产阶级在这一体系下“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主体上存在着”^⑤，而资产阶级国家则在实质上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⑥。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植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所塑造的历史土壤与社会矛盾之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⑦。基于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务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进行批判性扬弃，将现代化进程从资本的绝对支配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从而推动现代化从自发的、对抗的资本逻辑转向自觉的、协调的社会逻辑。

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辩证否定与历史超越方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扬弃其对抗形式，从而释放出被束缚的现代性潜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① 赵振华主编：《新质生产力路线图》，北京：东方出版社，2024年，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14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页。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①。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正是在其自身所创造的现代化物质基础中生成。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并非拒绝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而是旨在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剥削、周期性危机以及人的异化，即通过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替代私人占有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阶级对立，使社会生产服从于人的真实需要。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并致力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束缚与异化，始终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确立为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根本目标，其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在于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③。在此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为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超越资本对抗性逻辑的新道路，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的真正和解，进而推动现代化迈向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的文明新形态。

（二）社会主义对现代化路径的革新与曲折实践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考察，特别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考，在理论上突破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线性史观。^④ 他强调不能将西欧资本主义模式视为普遍公式，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甚至“有可能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而走向新型现代化道路，反过来促进西方社会走向新型现代化道路”^⑤。这一认识打破了现代化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单一历史观念，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起点。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直接描绘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蓝图，但他们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批判资本逻辑主导下现代化道路的野蛮性与暴力性^⑥，为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2页。

④ 段虹：《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历史展演与价值旨归》，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第30-37页。

⑤ 豆勇超：《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载《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第17-23页。

⑥ 贺敬奎：《列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略思想论析》，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第70-77页。

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列宁等后继者对现代化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启迪。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直面俄国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均不发达的现实困境，成功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可能性转化为实践突破。针对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尚未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①的论调，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先政治后经济”的新路径，主张无产阶级可首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进而凭借政治优势加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②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历史方向，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形成了“共时性”的关系。同时，列宁在结合俄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③，这不仅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主动推进现代化的核心构想，更在理论与实践上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落后国家相结合的正当性与现实生命力。

尽管列宁的早期探索为俄国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后续形成的苏联模式在长期实践中未能化解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最终构成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苏联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依靠指令性计划集中配置资源、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模式，它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推动了高速的工业化。然而，随着其体制的日趋僵化，苏联模式逐渐丧失了现代化所需的内生动力与多元发展能力。在理论层面，苏联模式未能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④，错误地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特征固化为“社会主义原则”，并把诸多有利于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要素简单斥为“资本主义”。在实践层面，苏联模式严重脱离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忽视了真实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仅依靠国家强制力驱动，而是要尊重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

② 王森、李玉才：《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及其现实启示》，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第120-13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④ 赵宏：《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及启示》，载《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2期，第40-46页。

特别是经济规律，并妥善处理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之间、国家力量与社会活力之间的辩证关系。^①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螺旋式前进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反思苏联模式、扬弃英美模式、借鉴北欧模式、学习东亚模式并警戒拉美模式的综合创新基础上，科学集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规律性认识，成功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与相互构建，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② 这一进程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定，即明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③，这一论断明确揭示了在生产相对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④，从而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现实立足点，摆脱了从抽象教条出发的空想。以改革开放为关键制度创新与历史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动了与现代文明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将现代化所需的发展要素与创新活力有机融入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进而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既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提升经济效率，又更好发挥了政府作用以维护社会公平与宏观稳定，在实践中超越了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传统理论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为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也不断夯实着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二者在辩证互动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从而系统集成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贡献了中国范本。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与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双向重塑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不仅在本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更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展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现代化普遍路径的能动建构力量。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近代中国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力卷入的“外发型”起点。正如马克思所指

^① 刘建武：《苏联模式衰败的缘由与启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第22-26页。

^② 庄泽林：《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载《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5期，第90-97页。

^③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④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16页。

出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①，这一冲击促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逐步瓦解。然而，中国并未停留于对西方道路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民族危机与文化自觉中开启了对自主道路的求索。这一历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逐步深化，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建构”的根本转变。^②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实质上是世界历史场域中一场深刻的“主体性重构”。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始终坚守并重塑了自身发展的文明主体性。这一进程生动印证了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可能性，正如现代化研究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非西方国家无须在文化上完全西化也能发展出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形态。^③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成功实践有力地解构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迷思^④，不仅回应了本国的历史课题，也为理解世界现代化从“单向冲击”到“双向重塑”的格局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全球化进程构成了深度互嵌、双向塑造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⑤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正是基于这一“世界历史”的语境展开，但其参与方式始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零和博弈、霸权争夺和中心—外围剥削模式。在早期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曾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第三轮全球化兴起，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战略主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开创了在开放条件下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⑥这一路径并非依附性发展，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全球市场的资源、技术及管理经验，同时依托中国自身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9页。

② 吴国富、钟玉婷：《科学社会主义史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载《理论研究》，2024年第6期，第44—53页。

③ [以色列] S. N. 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8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⑥ 郑必坚：《新时代中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载《理论导报》，2018年第5期，第17—19页。

产业体系和渐进式改革所培育的内生动力，逐步成长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①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当全球化遭遇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逆流时，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②，旨在建构一种真正的普遍文明，以超越西方文明基于“敌友区分”和资本逻辑的“虚假的共同体”^③。这不仅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注入了重要动力，也在实践层面诠释了一种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新模式。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本国发展道路的自主探索，也通过其规模效应、制度创新和交往理念，持续参与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现代化格局的演进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双向建构关系。一方面，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技术浪潮和市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外部参照、资源渠道和发展空间。^④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依托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力资源，秉持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理念，通过消除绝对贫困、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建设高效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实践^⑤，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新路径，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迷思，证明现代化道路能够基于不同文明传统与制度框架实现多样化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发展成果为世界提供市场、资本和公共产品，通过和平、合作及互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繁荣，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实践基础。面对全球在和平、发展、安全和治理等方面的赤字，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为国际社会应对系统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⑥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生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这不仅拓展了人类对现

① 徐晓明：《发挥四大独特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经济日报》2025年11月25日第10版。

② 李健著：《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历史的当代转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13页。

③ 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第4-21页。

④ 段虹：《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历史展演与价值旨归》，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第30-37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⑥ 戴长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理念创新》，载《光明日报》2025年8月15日第11版。

代化路径的认知，更以其和平性、包容性和共同体逻辑，为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合作、共赢的世界发展格局注入了积极动能，从而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 21 世纪的历史能动性 with 强大生命力。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植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并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性”及其内在矛盾时，曾科学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也为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即必须通过对旧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超越资本逻辑的支配，真正以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为旨归。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将这一宏大叙事具体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从而清晰指明了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双重使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进一步在实践中发展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多重维度的有机统一^③，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作为价值目标、实践路径和制度保障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④在当代的全面而生动的实践，其每一维度都深刻体现了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与重塑。

（一）制度形塑：社会主义原则的现代化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根植于其独特的制度基础，即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这一基础不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属性，也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结构性支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6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③ 韩喜平：《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 年第 8 期，第 1-14 页。

④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第 1 版。

在政治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并标志着一种新型政治文明形态的生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① 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发展道路独特性之间的内在统一，阐明了政治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保了国家战略能够转化为持续而连贯的社会实践。由此形成的政治架构不仅超越了多党竞争体制下常见的政策短视与周期性波动，保障了现代化进程的独立性与连续性，更形成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以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为轴心的治理逻辑，进而从顶层设计上有力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在经济维度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创新。马克思曾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内嵌周期性危机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则开创性地探索了一条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服务于社会主义总体目标的路径，其关键在于建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在这一机制下，中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尤其注重巩固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和命脉行业中的控制力与引领作用，从而确保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够稳定地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与长远目标。^② 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高效承载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更内在地蕴含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即通过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以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系统引导经济发展成果更公平、可持续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不仅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性路径，也为协调政治、社会、生态等多维度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离不开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系统性支撑。这一支撑并非不同制度的简单叠加，而是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基本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0页。

^② 郗戈：《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第88-98页。

经济制度等为基础，各层次制度相互衔接、彼此赋能的有机整体。^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不仅能够将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优势持续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与发展动能，而且可以系统性地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其深厚的实践根基与持续的自我完善能力，不仅有效规避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下因资本逻辑绝对主导而常见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和治理困局，也确保了现代化进程在保持战略方向稳定的同时不断释放出实践活力。这种根本性的结构保障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并为应对超大规模人口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伴生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价值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文明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在价值层面鲜明地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统摄着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重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地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②，强调人类的真正解放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③，这为中国现代化的人民性取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④，从而在新时期明确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将始终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进程将坚决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观，致力于协调推进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这一价值追求内在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克服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十五五”规划从宏观战略到具体政策都旨在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⑤，并将现代化建设所积累的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一价值内核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特征，使得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同向而行，更将汇聚起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最深厚、最持久的主体性力量，塑造

① 丁志刚、张书华：《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38-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④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3年第4期，第3-6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着现代化的根本伦理向度。

在生态向度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的自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①，而在利润率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②，由此引发“代谢裂缝”^③。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文明形态转型的战略高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并非对环境压力的被动回应，而是从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价值理念进行的系统性、深层次绿色重塑。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④，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⑤。这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价值源头和制度实践上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超越资本短视与局部利益，从人类整体及子孙后代的福祉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前瞻性规划与全局性调节，并在本质上规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从而赋予了现代化以深厚的生态伦理内涵。

从社会文明的建构层面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最终指向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这超越了将现代化狭隘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物化思维。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即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增强其均衡性与可及性，从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⑥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以及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大幅度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以及专业化水平，畅通并规范了人民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通道，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第579页。

③ 苏百义、林美卿：《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载《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第27-34页。

④ 《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3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⑥ 唐洲雁、李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载《红旗文稿》，2023年第20期，第36-38页。

从而更好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以及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构成了国家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微观基础与最终归宿。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演进中不断拓展人的自由发展空间，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与精神世界，最终指向马克思所揭示的超越“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的“自由个性”阶段。^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不仅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劳动异化与社会分裂的否定，也是在积极塑造一种基于社会公平正义、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协同共进的新型社会文明形态，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基础与人文精神支撑。

（三）文明超越：中华文明底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在文明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深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并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展现了其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③这精辟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与传统相割裂的“另起炉灶”，而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持续发展的伟大文明，其“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价值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历史纵深与文化根脉。^④这种对自身文明主体性的自觉坚守，使得中国在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文明底气，而非任何简单的模式移植与道路依附，从而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奠定了深沉而持久的历史文化根基。同时，中华文明特有的“和合”智慧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也从文化基因上摒弃了依靠殖民掠夺和霸权扩张实现现代化的陈旧逻辑，为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民族复兴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理念基石。^⑤

^① 丁志刚、张书华：《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38-53页。

^② 杨巧蓉：《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新图景》，载《光明日报》2020年9月1日第15版。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第9页。

^④ 吉明明：《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意蕴》，载《光明日报》2025年3月20日第6版。

^⑤ 杨发喜：《从“协和万邦”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红旗文稿》，2023年第14期，第43-46页。

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新”不仅源于深厚的文明底蕴，更在于其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石，对构成现代性的诸要素进行了革命性重组与整体性超越。在政治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全过程人民民主而非形式化、寡头化的民主；在经济层面，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在文化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协调发展而非精神世界的贫瘠与物化；在社会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而非阶层固化和社会撕裂；在生态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①这种涵盖“五大文明”的全面、协调的文明发展构想以其整体性和系统性彻底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线性史观，有力地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可能性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对资本逻辑进行有效的驾驭和引导，将发展从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单一目标中解放出来，使之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这一更高目标。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内在固有矛盾的自觉克服与系统性扬弃，从而展现出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文明新形态生动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螺旋式上升的科学预见，它是在批判性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现实探索与先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扬弃以资本为中心、以扩张和掠夺为特征的传统文明形态，从而转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归宿的新型文明。^②这条道路有力地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历史宿命的单线叙事，人类社会完全有可能在崭新的制度框架与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建构一个更加公平正义、更具可持续性、更为和平安宁的世界秩序。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实践中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文明的现代复兴，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与中国智慧，深刻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与引领未来文明发展的巨大创造力。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5年，第17-18页。

^② 北京大学现代化研究中心课题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载《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年第3期，第5-29页。

三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提振与塑造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重大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重要的理论活力与实践动能。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核心命题的系统建构，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性单一模式的话语垄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模式创新，从而激活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生命力。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直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困境，凭借其清晰的阶段性战略和持续的制度完善，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发展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具有参照意义的系统方案。这一进程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殖民扩张与零和博弈的传统逻辑，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新范式，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逐步改变了“资强社弱”的发展趋势，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注入了坚定信心与复兴动能。

（一）激活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更在现代化理论的深层逻辑上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即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逻辑。^① 西方现代化长期以资本增殖为根本驱动力，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内在导致社会关系的物化、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② 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新现代性逻辑则实现了社会主义逻辑、现代化发展逻辑与民族复兴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③ 这一逻辑既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机融合了中华文明积淀的治理智慧，其最终旨向在于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马克思所展望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普遍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逻辑指引下，中国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① 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逻辑及其超越意义》，载《社会科学辑刊》，2024 年第 5 期，第 5-11 页。

^② 刘同舫：《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困境》，载《理论视野》，2024 年第 1 期，第 68-76 页。

^③ 夏文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文明进路与世界意义》，载《北方论丛》，2025 年第 4 期，第 16-27 页。

代化的进程中^①，不仅注重利用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视通过法治建设与政策引导使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有效防范了资本无序扩张的负面效应。^②同时，在深度参与并塑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避免了依附性的发展困境，也积极倡导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从哲学基础、价值目标到实践路径，系统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科学驾驭和引导资本逻辑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既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又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激活，主要表现为以成功的实践回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社会形态。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为落后国家避免资本主义灾难提供了理论可能，但其实现严格依赖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因而未能回答夺取政权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多是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的国家，这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关乎制度存续的关键挑战。^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正是对这一难题的创造性解答。它不囿于经典理论的具体历史条件限制，而是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④基础上，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⑤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一论述的生动实践。它通过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体制机制与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等措施，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⑥的过程中，不仅规避了传统苏联模式的僵化弊端与西方现代化的陷阱，而且推动了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从而系统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5年，第23页。

③ 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第4-21页。

④ 张清刚、孙孟媛：《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7月30日第A02版。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7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主义这一时代之问。^①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国家能够在不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条件下，依托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将马克思关于“跨越”的设想从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中的伟大成就，从而显著增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复杂历史情境中的解释力与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以守正创新为根本方法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实践与发展树立了典范。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始终保持着“活的行动理论”^② 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贯穿着对守正与创新辩证关系的精准把握：“守正”体现为牢牢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从而确保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偏离；“创新”则体现为依据时代变迁与中国具体实际，对发展理念、体制机制等进行既大胆又审慎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③ 在政治领域，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协同作用的制度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④，从而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为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弊端，真正践行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⑤ 的人民民主理念。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理论的革新，而且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扎实推进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这些实践生动地诠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要求，超越了机械套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条主义思维。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

① 李桂花、柳丽萍：《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比较优势与世界意义》，载《学术探索》，2024 年第 9 期，第 1 - 12 页。

② 康晓强：《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发性发展》，载《人民日报》2025 年 3 月 27 日第 9 版。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6 - 17 页。

④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12 日第 9 版。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92 页。

有计划。”^①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协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场失灵”与国家过度管控的双重弊端。它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动力，打破了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为一成不变公式的教条主义思维定式，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与实践智慧，彰显了其应对新挑战、回答新问题的强大理论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最深层次塑造与彰显在于其通过自身实践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应对全球性的现代性困境贡献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系统性方案，从而在全球化时代重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感召力。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理论关怀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陷物质主义膨胀、社会两极分化、生态危机及对外扩张掠夺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鲜明特色，系统性地克服了这些弊端。^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③ 这一文明新形态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生态文明领域，建立健全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全球治理层面，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摒弃了通过战争、殖民和霸权实现现代化的老路。^④ 马克思曾展望未来社会是“人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⑤ 的理想状态，中国式现代化在 21 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丰富了这一理想，为解决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可行路径。^⑥ 这不仅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所指明的发展方向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② 唐爱军：《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7 期，第 4-2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81 页。

④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4 日第 10 版。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80 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世界现代化发展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 年 12 月 11 日第 A04 版。

历史的必然，更凸显了其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道义高度。长期以来，现代化模式被简化为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但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这一局限，它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强化国家治理，创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形态。^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实践，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掠夺性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与弘扬。

（二）为全球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现代化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落后、实现发展的共同追求。然而，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之下，经典现代化理论往往将现代化进程简化为单一的“西方化”路径，主张后发国家全盘移植西方的发展模式、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这种内嵌着历史殖民逻辑的路径致使许多追随国在实践中陷入结构性困境。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③，并不断再生产出人与自然、人与劳动本身相异化的生存状态。因此，许多南方国家在沿袭西方道路时，往往陷入“发展的幻象”，出现依附性增长与内部失序并存的局面，如拉美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与非洲部分国家的长期结构性停滞。而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弊端正在于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为中心，追逐资本利益最大化而非保障大多数人的福祉，其结果必然是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社会对立。^④由此可见，“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非但不是普世公式，反而可能成为自主发展的枷锁。中国式现代化则以独立自主的伟大实践成功打破了这一迷思，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罕见奇迹。^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⑥

① 夏文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文明进路与世界意义》，载《北方论丛》，2025年第4期，第16-2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

④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7页，第80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这一重要论述从哲学高度与实践维度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历史必然性中探寻多元可能、坚持自身发展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新选择”的核心在于其系统、辩证且立足国情的方法论创新。它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所推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激进私有化方案，而是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规律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中长期战略规划、渐进式改革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国向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脱贫攻坚、民生保障、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①，在现实发展中阶段性地体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的崇高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③中国式现代化以实践证明了现代化进程并非必须在“依附”与“脱钩”之间做单选题，而是可以通过将自主创新与借鉴他国经验相结合，探索出适应本国历史文化土壤的发展策略^④，从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思维禁锢并进行立足本国国情的创造性探索提供了具有现实参照价值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深刻变革，更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将其发展动能转化为促进全球南方共同进步的公共产品，从实践成效上丰富了“新选择”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以坚持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为必然要求，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和发展。^⑤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共同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倡议等开放性平台，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南南合作从传统援助向可持续的赋能式协作升级。^⑥这些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从应对贫困与发展赤字等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④ 张耀铭：《现代化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陷阱”》，载《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6期，第219-234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104页。

实挑战出发，从而为全球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这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基于“中心—外围”依附逻辑的传统全球化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使南方国家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与规则接受者的被动位置。中国则凭借其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有效推动了全球工业品的“去垄断化”与普及化，为重塑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发展格局提供了实质性支撑。从以物美价廉的通信设备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到以高质量低成本的光伏产品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再到以对外合作项目提升当地工业化能力与治理水平，中国正在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伙伴国家抓住发展机遇。^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②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贡献了一种以平等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交往新范式。^③这不仅有力地撼动了不平等的世界发展格局，更为各国基于自身文明传统走出一条自主、和平、包容的现代化新路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动力。

（三）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发展是基本规律，后发国家的道路选择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不仅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更将其发展模式塑造为具有“普世”色彩的评判标准，形成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叙事惯性。^④马克思曾提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⑤这一观点与后来苏联模式受挫折的共同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势。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早已揭示，后发国家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可能性；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的终结，它恰恰呼唤着符合各国实际的新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正是对“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的突破性解构。它通过立足本国实际、融汇传统与现代的

^① 赵龙跃：《全球发展倡议赋能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8期，第26-33页。

^{②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81页，第80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世界现代化发展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2月11日第A04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发展实践，成功开拓了一条既超越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路径的现代化新途径，以扎实的发展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性构建中的独立价值与可行空间，标志着世界现代化叙事从“单一性与中心性”向“多元性与平等性”的重要转向。

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质上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其历史展开始终伴随着内部的对抗性矛盾与对外的扩张性掠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实则建立在对内剥削劳动者、对外借助殖民与战争进行掠夺的双重剥夺之上。^①它不仅未能兑现启蒙思想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②，反而加剧了社会对立，其所谓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而言往往意味着“失去财产的自由”，其工业进步则“使劳动群众的贫困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所标榜的“理性王国”^③实际上是将自由与平等限定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分享现代化成果之外。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现代化实现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不再重复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切苦痛”^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作为逻辑起点，通过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机制、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和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等措施^⑤，着力破解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民生痛点，加强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通过动态发展持续改善民生，使现代化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更从制度设计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难以避免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对立问题^⑥，从而在比较制度层面上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与道义高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显著成就深刻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推动着国际格局从“资强社弱”向更为平衡的方向演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顶层设计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26页，第527页。

④ 吴波著：《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⑥ 孙立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载《红旗文稿》，2024年第18期，第38-41页。

实践探索相结合，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①，成功走出了一条既立足本国国情又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本质上是一条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从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出发的全面发展之路，其演进脉络体现为“理论生成—问题解决—理论变革—实践深化”的辩证互动过程。^② 基于此，中国不仅在关键时刻稳住了社会主义阵地，更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时代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③ 这一成功实践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注入了信心，更通过显著提升社会主义的实践效能与道义感召力，深刻重塑了两种社会制度竞争共存的全球态势，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实现历史性回升。^④

从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内涵标志着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新型文明形态的兴起，并在深层结构上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西方现代化进程长期伴随着殖民扩张与暴力掠夺，其内在矛盾日益外化为全球治理赤字与发展困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嵌着和平发展与包容共生的文明基因。这不仅源自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也植根于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与共同发展的本质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⑤，“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欺负、压迫、奴役其他国家人民”^⑥。正是这种和平属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化的全球剥削与依附体系，将超大规模人口发展、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目标整合为系统且可行的发展模式，进而在实践层面重塑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根本经济逻辑上，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文明。^⑦ 马克思曾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演进的推动作用，但也指出了资本具有无限扩张与支配社会的本性。^⑧ 传统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② 钟慧容、刘同舫：《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0-15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32页。

④ 陈晶：《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载《江南论坛》，2024年第8期，第33-38页。

⑤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年，第11页，第1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页。

社会主义模式曾试图彻底否定资本，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创了“驾驭资本的文明形态”，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范资本行为，发挥其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约束其逐利本性。^①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在价值与实践层面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抗性逻辑，更在制度层面展示了超越资本文明的可能性。当前“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发展态势并非简单的力量转移，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通过和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重塑了现代化全球图景的深刻体现。这不仅从文明根基上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感召力，更在重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进程中，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文明参照。

（四）提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与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从根本上回应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理论难题，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强大的信心支撑。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历史终结论”一度弥漫，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严峻考验面前始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稳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更使其焕发出蓬勃生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②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③中国在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成功规避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创造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④的世界奇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实质性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跨越，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洞见从一个待验证的命题转化为拥有坚实支撑的现实，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主义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极大地增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力量对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④ 金社平：《在决胜“十四五”谋划“十五五”中深刻感悟——“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载《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0日第1版。

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信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实践范式与文明参照，进一步增强了其理论自信与发展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时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这一新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形成了“物质富裕、政治民主、精神富足、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文明新图景^②，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内在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代谢断裂”的生态批判，实现了文明类型的整体创新。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弘扬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制度成果，显著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工具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中国通过自身扎实的发展成就力证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从而为各国探索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超越纯粹理论构想的系统性启示，并在实践维度上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制度效能、卓越的战略规划能力及其清晰的阶段性推进逻辑，共同构成了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的关键动能生成与转化机制，并从目标与路径相统一的层面系统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操作性，从而显著提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与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体现为持续、稳定的长远规划能力和高效的战略执行力。从“四个现代化”目标^④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后“三步走”战略^⑤的制定，再到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⑥的统筹推进，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连续、稳定和科学的中长期规划，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有机结合，确保了政策延续性与战略定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② 张占斌：《“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探析》，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11期，第4-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13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① 这种基于科学规划与稳步推进的治理模式使中国不仅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应对挑战并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还能够把民族复兴的宏大愿景转化为扎实的阶段性成就，从而展现了超越西方政党轮替导致的政策短视与效能波动的“中国之治”。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去对待。”^②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社会主义理念转化为系统、可行且连贯的治理方案与发展战略。通过十五个“五年规划”等中长期规划治理，中国有效解决了人口超大规模国家发展中面临的接续性、资源动员和战略排序难题，将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长远价值目标分解为可评估、可累积的阶段性治理成果。以“十四五”时期为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 110 万亿元、120 万亿元和 130 万亿元三个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0632 美元提升至 13445 美元，内需贡献率达 86.8%，货物贸易规模年均增长 8%^③，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这种“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④ 的生动体现。它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持续发展动能、将宏大目标分解为可行步骤的中国智慧与实践，不仅从内部机制上增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韧性、定力和后劲，也通过创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与历史性成就，为世界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力量探索可持续的社会变革路径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系统性蓝图，从而在信心与动能两个维度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支撑。

四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最新重大成果，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进程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关键机制，在有效规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同时，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在人口超大规模国家中实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17 年，第 27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9 页。

③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25 年第 3 月 1 日第 5 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5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富裕的稳步推进。它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即科学社会主义并非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现代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历程。中国共产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与战略引领作用，不断推动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从而确保了现代化进程始终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展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性地把握了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发展与安全等多重辩证关系，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容纳现代化所需的创新活力，更有力地矫正了西方现代化模式长期面临的阶级分化、生态破坏、文明冲突等固有困境，从而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突出体现在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以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拓展。在路径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发展成就与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特别是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的平等互利、聚焦发展的合作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依附型或霸权型现代化模式的替代方案。这一方案通过坚持独立自主、民生改善和渐进改革等系统性发展，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现代化道路注入了实质信心与可行经验。在文明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的文明观，抛弃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预设和“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致力于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当代重塑，更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内在矛盾的历史性超越，从而指向一种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整体进步、兼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文明未来。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变，实质性地改善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态势。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外强加或推广某种固定模式，而是以自身成功实践证明，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通过与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在深度融入全球治理的同时保持发展自主性，在回应人类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彰显其制度优越性，从而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习近平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页。